

金融史話

程庸鎬 編著



安徽省农村金融研究所

金融圈史话

程庸镐 编著

安徽省农村金融研究所

— 目 次 —

楔 子

——“金融”探名并从文学作品中看金融·····	1
钱庄发迹记·····	9
沙船——上海钱庄的摇篮·····	16
惯做官场生意的票号·····	22
古老的典当业·····	28
钞票漫话·····	37
银行的由来·····	42
从上海外滩说开去·····	48
中国第一家银行成立以后·····	56
商业银行一瞥·····	64
各霸一方的地方银行·····	73
在铁蹄下·····	78
中日货币战·····	84
通货膨胀与“黄金政策”的失败·····	89
胜利声中的金融恐慌·····	96

在钞票废纸堆中葬身覆灭	101
.....	
孙中山在国外发行筹饷票券	108
从井岗山上的花边厂谈起	111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巨擘	118
外国记者笔下的冀南银行	122
货币三角斗争观	127
中国人民银行诞生记	133
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晨光	138
.....	
徽州朝奉和当铺	143
安徽地方银行始末	146
金融创业在皖南	151
皖南新解放区货币斗争目击记	156
关于“朝奉”的补遗	161
后 记	165

楔 子

——“金融”探名并从文学作品中看金融

“金融”这个词儿，望文生义，自然是资金通融的意思。从内涵上讲，既是包括货币资金，也是包括信用制度的。

信用的发生，也就是借贷行为的发生，从古代考察，应当是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和真正的货币产生之前就有了，差不多同商品交换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我国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社会已有私有财产，也就具备了产生借贷行为的条件。从西周开始铸铜为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货币。到了东周末年，才出现一种外国内有方孔的钱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枚圆形硬币。

不管货币流通也好，借贷信用也好，都没有使用“金融”这个字眼。一般认为，我国古籍中有关借贷信用记载得最早的是《周礼》这部书，当时的金融机构叫“泉府”，相当于近代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混合体。它经营的信用业务叫“賒贷”，是我国最早的政府信用。

战国时代，高利贷信用非常猖獗，放款取息的事情非常普遍，当时叫作“假贷”或“称贷”。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提到放债致富的例子，所谓“货殖”就是经商，他把放债信用列入经商之列，大概指的是商业信用。

自秦汉统一中国以后，国内外贸易开始发展，借贷行为也就更多了，不但商人资本猖獗，高利贷资本也很发达，西汉代首都长安就有一个放款市场。南北朝时代盛行佛教，对寺院的施舍，包括土地和钱币，成为当时提供信用的一个重要来源。到了隋代，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商业发达，各种信用事业更加兴盛，除私人放款外，还有政府机关也经营放款业，叫作“公廩钱”的营运。

唐代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空前发达，首都长安的西市出现金融市场，提供信用的有富商、官吏，有抵押的“质库”，有一般借贷的“公廩”，有收受存款和寄存保管的“柜坊”、“寄附铺”和各种商店，有兑换、买卖生金银的金银店，还有办理汇兑（飞钱）的商人组织。

宋代王安石变法所制定的市易和青苗法，前者是一种抵押信用，后者是一种农业信用。南宋时期杭州五间楼一带，金银钱交易铺有百余家。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宋代的“交子”，比西方由瑞典银行发行纸币要早600—700年，使得元代初年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见到中国的纸币而大为惊叹。

中国的信用事业在金、元时代没有重大的新发展。信用的通融仍然依靠私人放债居多。抵押信用是民间经营的，叫作“质典库”或“解库”。另有公典叫作“流泉”。卢世荣曾奏请建立“平准周急库”，以平准币值，为百姓提供低利放款。这“平准周急库”相当于国家银行，但后来并没有实行。

明代以后的信用发展，已在本书中大致罗织了，不再赘述。

我之所以源源引来，并非“数典”以免“忘祖”，一是

为本书作个“楔子”，二是为本书“正名”，从考证“金融”这个词儿中谈些金融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没有使用过“金融资本”这个词汇，而是说“银行资本”或“银行家资本”、“借贷资本”或“借贷货币资本”以及“生息资本”等等。不过，话得说回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曾经使用过“金融贵族”、“金融巨头”、“金融市场”这些词儿的。“金融贵族”指的是1848年法国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是一些高利贷剥削者和政府公债投机者。而银行则成为这群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总府。他们成为当时法国保皇主义联合势力的重要领导集团，而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秘密的时候，也曾提到过靠公债投机大发横财的“金融家”。②

在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帝国主义，他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似乎提到过“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但原译本（1949年莫斯科外文版）却为“财政资本”和“财政寡头”。

前者俄文原文为《φNHαHcoBblH^V KaπNTαπ》，是指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结 合。按《φNHαHc》一词，有财政、财务、金融的意思。我国在1959年编译出版这本书时，才把“财政资本”改为“金融资本”。③

我国习惯起用“金融”这个词儿从何而起？难于查考。

据引证当是在1897年成立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之后。那时，正是我国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商品货币市场不断扩大、资金通融也逐渐相应频繁之际。1908年清朝政府颁布《银行则例》，将全国银行分为：中央、交通、殖业、储蓄四种，大体上明确了资金通融的序列。官办民办，中央地方，新式老式，中国外国，大大小小各种资金通融的渠道四通八达，它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居然成为举足轻重之物。资金通融的简写即“金融”一词也就渐为广泛运用。

比如说，1910年广西银行向日本定印兑换券一批，该券背面印有264字的冗长告示，其中就有“利商便民，金融活动”字样。1912年9月，广西财政司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的报告中也曾提到“金融机关”。④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由农民协会创办的浏东平民银行所发行的临时兑换券上就印有“活泼地方金融”字句，1928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建立劳动银行的通令中也曾提到“救济金融，便利市面交易。”⑤

“金融”一词传入日本后，渐被广为运用，是在三十年代初日本从废除金本位制向管理通货制过渡，也就是从通货紧缩政策向通货再膨胀政策转变的时候。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后，整个日本经济领域逐渐布满了统制法网。对于银行业，政府一方面始终以银行业者的协作为中心，另方面对它实行了一定的统制。当时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资金统制法令，如《公司分红及资金通融令》和《银行资金运用令》等，使银行及
· · · ·
其它资金通融机构开始纳入政府统制之下。还在伪满洲国遍

地组织了“金融合作社”⑥

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倡确立“经济新体制”，强制实行日本经济军事化。首先动员日本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和日本劝业银行等特殊银行向军需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接着，普通商业银行也结成了“战时共同贷款团”。1941年7月，又配合产业界的“新体制”，订出了《财政金融基本方策要纲》，借以满足军需产业所需资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政府首先改组了日本银行，两个月后又公布了《金融统制团体令》，成立了“全国金融统制会”，1942年2月设立了“战时金融金库”，发行政府公债，扩充军需资金。⑦

由此可见，“金融”一词在日本广泛使用开来，颇还带有难闻的火药味哩。

现在谈谈从文学作品中看金融。我觉得金融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现象，必然反映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来。古今中外一些文学名家以金融为题材、或以金融为情节的作品，还是屡见不鲜的。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拍案惊奇》等等几乎都有涉及金融生活方面的情节。例如《金瓶梅》初刻本（后来被人窜伪成了禁书）⑧，反映了很多明代末年的社会情况，颇有历史价值。在金融方面，那时的货币主要有纹银（似今金条）元宝（象船形）纹银（是成色最纯的），还有碎银（大小碎块的），辅助货币是铜钱，但很杂乱。该书第

33回中有陈经济唱的《山坡牛》这曲调子，全是用银钱名编成的，这些银钱名有：外膛儿，细丝，狮子头，定儿，黄票儿，元宝儿，铜馨儿，印钳儿，双火同儿，礶子，花银，竹叶脸儿，官银、三倾儿，开元，祥道，祥元，黄边钱，鹅眼儿，榆叶儿，笔管儿，古碌钱，棍滑馒儿，里沙……等等。

⑨书中还反映了当时的币值和物价，这些都是研究货币的“稗史”材料。

从近代作家的创作中，也出现过典型化的金融界人物。茅盾在1931年写的《子夜》中，在那外侮日深、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上海金融界三巨头组织了秘密公司，利用动荡的时局，从事公债投机，进行买空卖空。当时有所谓关税、裁兵、编遣三种公债，人们称为“棺材边”，沾上手凶多吉少。然而，赵伯韬却是一位金融投机家，他脸上总是泛起胜利者的狞笑。而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呢，“他是办实业的，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结果呢，一败涂地，几乎自杀。还有放高利贷起家的冯云卿，不惜倾家荡产在公债上押宝，却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境地。一部《子夜》写尽了黎明前的黑暗，这黑暗的角落，那能不牵满金融界的蛛丝网络？

外国作家以金融为题材的作品也不少。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善于通过作品剖析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曾为恩格斯所称赞：“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在1837年写的《纽沁根银行》，比起高布赛克（《高利贷者》中的人物）和葛朗台（《欧也妮·葛朗

台》中的人物)来, 纽沁根是个更有雄才大略的银行资本家, 其手段的巧妙与毒辣, 更比《红色旅馆》中的泰伊番不知高出多少倍。他熟知证券交易所的奥秘, 一手操纵交易所的风云变幻, 他通过三次倒帐清理, 杀人不见血地掠夺了千家万户的财产, 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头, 而上当受骗者们却把他当作天下第一等正直的银行家。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在1912年写的《金融家》, 主要描绘了一个银行职员儿子法兰克·柯帕乌成为金融巨头的个人发迹史, 以及他在费城金融界的罪恶活动。小说中透过柯帕乌与市财政局长斯坦纳的狼狈为奸、营私舞弊, 揭示了美国资本家剥削人民积累财富的卑劣行径, 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

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1924—)的小说《浮华世家》(改编成电影《华丽的家族》), 从特定的角度上说, 是专门描述银行资本家怎样办银行的。日本关西财界赫赫有名的万俵大介, 他所办的阪神银行, 具有资本主义康采恩一套管理办法。比如说, 用打歼灭战的办法, “象追捕野兽的猎人一样”去吸收存款, 各分行半径500米以内的主要往来户要全部争到手; 发放大宗贷款要召开贷款方针会议, 审查贷款户的资金周转表和有关贷款的档案材料, 有的还要到现场审查; 在增加存款的同时, 还要按平均每一家分行、每一个人获得存款的比例, 同其他银行比较, 看看效率如何。另外还要看看为了提高资金利用率需要多少经费, 以考核经营效率如何。正如万俵大介说的: “银行工作既是卖信用, 也是买信用。……因此银行经营首先需要稳妥。光稳妥还不够, 还要积极, 这就是我们一向的主张。过份稳妥就容易畏缩不

前，而过份积极缺乏稳妥又往往会带来失败；我以为两者兼收并蓄才是银行的经营秘诀。”山崎丰子的这部小说，取材于金融界，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说的，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对“金融界的禁区”银行采访，远比她想象的困难得多。她痛切地感到：“它禁闭得比医学界更加严密。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从事采访和学习金融的基础知识。”当然，她所描写的阪神银行，是现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个缩影，在金融垄断、兼并争夺中的那样不择手腕，既残酷，又微妙，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脉相通的。还借用她的话说：“可以发现以往无法了解到的银行同政界、官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夹杂在里面的人间戏剧”。她不愧是一位洞察社会现实的现代女作家。她於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两次访问了中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注 释

①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499页。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3页。

③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页和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3页。

④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第81—86页。

⑤《中国金融》1981年第9期、第10期。

⑥⑦《日本的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21—24页。

⑧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第54—63页。

⑨同上书，第137页。

钱庄发迹记

提起钱庄，现在的年轻一辈人也许不甚瞭然，未曾见到过。但从茅盾创作夏衍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中，还能看到一些影子。当林家铺子几经惨淡经营终于濒临破产林老板逃之夭夭的时候，惊动了与之往来的大大小小的债权人，大家都吃了倒帐。而捷足先登封存林家铺子底货的，便是恒源钱庄。这写的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江南一个小市镇上的故事，却也反映了当时旧中国金融资本活动的一斑。

钱庄起源于何时？据说明朝就有了。不过，当时叫“钱铺”。这名词最早出现于《金瓶梅》一书。①该书第93回有两段写道：

“敬济自此就在晏公庙做了道士……也有布施钱米的，……这任道士将常住里多余的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这冯金宝收泪道，……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钱铺的兴起，是由钱币的兑换而来的。当时正是明朝政府大开铸炉之后，钱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火漆、镰边等。这是兑换业发展的机会。有些商人或是其他经常收进铜钱的人，想要换成银两，就可以贩卖铜钱的生意。例如寺观的僧道，平日收进施舍的许多钱米，就可以开一家钱米铺。如果兑换业务

发达，单靠换钱也可以维持，自然就有一些人专门开设钱铺了。

在15至17世纪的明朝年代，欧洲也产生了钱币兑换业。当时在欧洲城邦市面上（如威尼斯）流通着许多外国钱币，大小轻重不一，真假难分，商民感觉不便，于是出现了钱币兑换业。起初规模不大，有些商人只在市场上摆一个钱摊，或设一个钱柜或钱桌。后来由于贸易发达，交易频繁，就成立比较大些的信用机构，如公元1408年在日诺亚设立圣乔治亚金库，公元1587年在威尼斯设立利雅图银行，不但替商民估定钱币并给予兑换，而且提供办理存款的便利，在收到商人各种钱币之后，折合成标准货币，记在帐上，商人可以使用这种帐面货币清算债务，这样就可以免除秤称估价的麻烦。后来并且利用这种存款作为放款。

明朝的钱铺在产生的初期，也有叫“兑店”、“钱店”的，都是经营银钱间的兑换生意，其规模当然是很小的，有些还只是摊子式的钱桌。这种摊子式的钱桌，以后可能慢慢扩充成钱店的。即使是到了明朝末年，钱桌仍然为数不少。据《崇祯长编》卷一记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户工二部都察院曾写道：“其京城内外，所有钱桌、钱市，着厂卫五城衙门严行禁缉，……”。万历五年（1577年）庞尚鹏曾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的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钱，以通交易。

到了明朝末年，钱铺才逐渐发展为钱庄，成为一种近代的金融机构。它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而且积极地揽作放款，对顾客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方便。但同时也保留下来一些规模较小的兑钱铺，在当时私钱盛行的情况下，仍然

相当活跃。看来，无论是开设钱铺（也称钱肆）或是开设钱庄，都是一项吃利赚钱的行当。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一些说部中，就曾描绘到开设钱庄的情况。例如：

“常熟城中居民开钱肆于焦家桥侧近。……”（见《猗园》第十三回）

“又想起了那一日在钱庄上换钱，晁住正在那钱庄上换金子。”（见《醒世姻缘》第十一回）

“第一季来旺一向得了南宫吉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又卖青布，开钱庄，极是方便，吃的黑胖。”（见《隔帘花影》第三十六回）

“那城中开钱庄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庄的说道，如宅上要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庄支取。”（见《醒世姻缘》第一回）

不过，明朝末年的钱庄，由兑换钱币只发展出放款业务来，而存款业务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存款放利缺乏保障，不论公家或私人，都习惯于把钱财窖藏起来。明朝大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就是这样，把许多白花花的私银深埋地藏。据《泾林续集》记载，严世蕃“家窖深一丈，方五尺，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由于盛行窖藏，大量资财沉睡地底，就不能供人利用了。

到了清朝初期，钱庄的主要业务，仍然还是兑换。所以叫做兑换钱庄或兑庄。1906年出版的《文物》第一期曾刊载清朝乾隆二十四年徐扬所画的一幅《盛世滋生图》，图中有九家钱庄，一家兑庄，一家兑换钱庄，两家兑换银钱。这时的钱庄信用业务比较狭窄，多半是亲朋私人之间或少数素有往来的交道主，一般工商业者较少。在信用往来中，钱庄开

始发行了“银票”和“会票”。“银票”是一种期票，即定期付现的意思。而存款收据也叫做“银票”。后来似乎存户也可以签发，命令钱庄付款。如《天豹图》第二回写道：“李爷道：我写一张银票与你，到如春银号去取。”“会票”则是一种异地的支付命令书。陆世仪在《论钱币》一文中曾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资到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这是从汇兑业务中产生出来的，道光初年（1821年）已使用会票的名词。如果发行会票的庄铺信用好，它也能在市面上辗转流通，和银票差不多。

清初就有官钱铺的设立。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想把柴卖常平仓所贮米谷所得的钱文换成银两，便于贮存。雍正九年（1731年）因钱价昂贵，户部叫官钱铺担任调节钱币流通的工作。凡是政府柴米所收的钱文，都交由官钱铺收兑白银，兑入白银又照时价收钱，这样就使钱币循环流转。这段史实，在《世宗宪皇帝实录》第108卷中都有记载。

乾隆二年（1737年）还由户部和提督衙门奏请在京师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用银两向当铺收进制钱，再向市面抛出，以平钱价。在当时，钱庄和银号很为活跃。钱价的波动，多少受它们的操纵。嘉庆年间，据《仁宗睿皇帝实录》第225卷记载，北京的钱铺不但从兑换中取利，而且发行钱票，有些甚至陡然歇业逃匿，使持有钱票的人无从兑现。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延续到道光年间还是盛行的。当时北京城内开设的钱庄大概总有四五百家，有些还是康熙、乾隆年间开设的。

晚清几十年间，是钱庄的最盛时期。那时，正是1840年

英政府发动鸦片侵略战争以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22年）因清政府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打掉了“闭关政策”，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乘机而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业务逐渐发达，除普通存放款以外，多少受外商银行的影响，还开办了“贴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业务。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钱庄票据有期票、庄票、汇票、银票等。随着沿江、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活动中心，也就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光绪34年（1908年）颁发的《银行通行则例》中所列举银行经营的业务，如票据贴现、短期拆息、存放款、买卖生金银和兑换、代收票款、发行汇票和银钱票等，都为钱庄所经营。

1903年间，李宝嘉所写一部最早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不少地方描绘了当时钱庄业务活动的人和事，是很细腻而丰富的。他在第24回到第28回中，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刻画了合资开设在北京前门外一爿钱庄的掌柜的生动形象。这家钱店的掌柜外号叫黄胖姑，是一位眼观四方八面玲珑的市侩式的人物。他不仅“在京年久，说的一口好京话”，并且“京城上下三等人人都认得，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他见人满面春风，“那股要好的劲，画亦画不出”，与人谈吐察颜色，“何等刁钻”。他惯做官场的买卖，生怕“被人家分做了去，不肯放松一步。”那个从河南进京引见谋干前程的贾大少爷，到京的第二天就去奉拜了他，托他在官场上下走门路，还把汇来京的十万银子寄存在他的钱庄里，由他经手开银票，划用场。后来终于钱用光了，划完了，贾大少爷的官